

历史责任与“文革”记忆 ——读贾平凹的《古炉》

杨剑龙¹, 陈永有², 王 童², 曹晓华²

(1.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2.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古炉》是贾平凹带着“文革”的责任和记忆,以狗尿苔这个孩童为叙事视角,写“文革”来到古炉村后引起的村民的心态、生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古炉》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风格,在对乡村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抵达人性的本真,在对“文革”神圣性的嘲讽中挖掘其荒诞,在对魔幻世界的勾勒中蕴含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在一场场闹剧背后显露出贾平凹对“文革”的深思。

关键词:贾平凹;《古炉》;“文革”;写实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1)04-0001-06

杨剑龙:今天我们讨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在当代文坛,贾平凹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在创作《古炉》时的心态特别重要:“字画收入使我没有了经济的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写我想写的东西。”^{[1]607}《古炉》与他前几部长篇小说不一样,他在小说创作中有一种探索。《秦腔》写改革开放后当下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乡村带来的负效应,而《古炉》又回到了历史。贾平凹带着历史责任回忆“文革”,“文革”给我们这代人的印象非常深。贾平凹作为作家,在“文革”过去这么多年后用理性和冷静的心态回眸、反省“文革”,历时4年创作了60多万字的作品,贾平凹强调《古炉》要慢慢读,不能用看电视剧的心态来读这部作品。《古炉》把视角放在被称之为古炉的小村庄,结构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散文化的笔调写“文革”,写古炉村人在“文革”到来后的巨大变化,写那个年代中人与人的争斗、倾轧,“文革”作为历史记忆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反省。

一、琐碎与本真

王童: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是《古炉》在叙

事上的一大特点。贾平凹努力把“文革”背景下古炉村民的心理心态和所作所为琐琐碎碎地展现出来,使小说成为一幅如实勾勒乡村“文革”历史、细腻描摹乡村“文革”生活的画卷。小说情节没有经过作家的刻意杜撰和雕琢,情节线索若隐若现,呈现出生活本身的混沌、模糊和复杂。贾平凹说:“古炉村里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是我的记忆。”^{[1]606}正因如此,作家对笔下的人物事件非常熟悉,他“用具体的事情来展示人物”^[2],用“密实的流年式的”^{[3]518}写实笔法,努力把记忆中故乡的“文革”生活,通过这种有血有肉、充满乡土气息的形式表现出来。

曹晓华:《古炉》在“冬部”几乎都是写日常琐事,这种特点在他之前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有评论者认为贾平凹的作品是“细节的洪流”^[4]。贾平凹擅长在细节中展示历史进程和脉络,就像他在《高老庄·后记》中所说的:“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5]在《古炉》中同样找不到清晰的线索,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融入小说中的磕磕绊绊,似乎真的站在这小村中看着这些人事纠葛。贾平凹还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

收稿日期:2011-05-03

作者简介:主持人:杨剑龙(1952-),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等。对话者:陈永有(1987-),男,浙江三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王童(1987-),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曹晓华(1988-),女,上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5]“古炉”是一个整体的意象,虽然古炉村发生的事是“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缩影,却象征着整个中国社会。

陈永有:关于《古炉》的这种描写手法,早在《秦腔》发表后学术界就有评说。京沪两地研讨会上有人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是对近年来许多凌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6]186},郜元宝先生更直言“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的闲言碎语”^[2]。以李建军为代表的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些细节描写是“琐碎、芜杂、混乱的自然主义描写”,而缺少“那种富有典型性和表现力的描写”^{[6]187},并且指出贾平凹本人沉溺在这一“烂泥塘”^{[6]187}里,这是作品的一大败笔。其实,倘若从中国农村发展的进程看,《古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秦腔》的前传,在生活琐事的描写上与《秦腔》是一脉相承的。《古炉》对细细碎碎生活琐事的描绘,看似平淡和琐碎,却还原了常态化的农村日常生活,透露出了人性的多重侧面,勾勒出了生活和人性的本真,有其独到的价值和意蕴。

杨剑龙: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带有浓烈的乡土色彩和地方气息。贾平凹的散文机智、幽默、诙谐,泥土气中充满了哲理,但他的小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古炉》《秦腔》都是写中国乡村社会的史诗,前者写的是“文革”时期,后者写的是改革开放时期。他的小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注重情节,某种程度上带有散文化的倾向。有的学者认为小说需要有情节、矛盾冲突,但贾平凹用散文的手法写乡村、写乡村中的人生,类似于鲁迅说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喜剧,英雄少而平常人多,以琐碎的描写展示乡村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尤其是“文革”时期乡村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和心态的变迁。

二、神圣与荒诞

曹晓华:“文革”来到了古炉村,联指与联总两派的争斗变成了村里两大宗族的争斗。朱姓、夜姓两大家族上演的闹剧消解了所谓革命的神圣性。有一个荒诞的情节是,当村里的杂姓长宽面对红大刀、榔头队两方的争取左右为难时,竟想用抛硬币的方法决定到底加入哪一派,因为“咱不参加好像咱是五类分子,是不革命了,心慌慌的。瞎好参加一个组织,谁也就不欺负咱了”^{[1]346}。书中的主人公狗尿苔原本是“又柔又顽”^{[1]298}的蘑菇,“柔”和“顽”也是狗尿苔的生存之道,他同时被两派人看不起,又同时为两

派人使唤,看似东倒西歪、弱不禁风,却在困境中表现出生命的韧性。他一直在寻找一种“隐身衣”,其实四类分子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保护他的“隐身衣”,因为他加入不了任何一派,所以反而远离了危险的漩涡中心。

杨剑龙:以现在青年人的眼光来看“文革”,似乎那是一个可笑荒诞的时代,其实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就是那么荒诞。“文革”留下的阴影是根深蒂固的,贾平凹在创作时一直在反思“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文革”的风暴席卷了所有人,贾平凹笔下卷入风暴的人物形象背后有着值得思考的问题。探讨“文革”,从某种角度讲是探讨文化、探讨人性,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人性之恶会达到极致。

陈永有:古炉村的民众身上几乎都存在着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道理似乎明摆着:如果霸槽是偷偷摸摸干,那是他个人行为,在破坏,但霸槽明火执仗地砸烧东西,没有来头他能这样吗?既然有来头,依照以往的经验,这是另一个运动又来了,凡是运动一来,你就要眼儿亮着,顺着走,否则就得倒霉了,这如同大风来了所有的草木都匍匐,冬天了你能不穿棉衣吗?”^{[1]219}神圣的革命运动背后是民众的自私、无奈和可怜,这种处事哲学往往造成荒诞而可笑的悲剧,就像贾平凹说过的“可怜人肯定有他的可恨处”^{[3]155},这也是民众身上体现的某种劣根性。

王童:《古炉》叙写的是一部“文革”史,也是一部人性异化和伦理道德沦丧史。在小说中,“文革”成为一个导火索,它把封锁着人性丑恶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人性的恶得到诱引和释放。霸槽这个看不惯所有事情、对任何人都不服气的不安分子,把红卫兵黄生生带到村里,借黄生生的满口“文革”理论震慑对“文革”一窍不通的支书,并带领几个姓夜的村民大破四旧、打砸抢烧,村民们却不敢阻拦,人性中的魔鬼被最早地释放出来。接着,姓朱的村民看到姓夜的村民可以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平时勤劳善良的农民由文斗一步步走向武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就弄到了这一步”^{[1]460}。也就是说,古炉村村民一旦陷入“文革”语境,不仅恶被激发出来,连自己都不受自己控制了,不知不觉地都残忍凶恶起来。

杨剑龙:《古炉》让我联想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古炉村人革命,阿Q也革命,这两场革命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闹剧。被人瞧不起的阿Q叫着“革这伙妈妈的命”^[7],别人看他的眼神就不同了。乡土

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革命风波总与宗族有关。阿Q本姓赵,但别人不准他姓赵,因为他的地位太卑贱了。他的革命目的就是打砸抢,满足个人私欲。“文革”中,人也是穷则思变,通过革命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在乡土中国,宗族始终是最基本的伦理结构单位。许多乡村矛盾是家族矛盾,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许多题材是关于家族械斗的。《古炉》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鲁迅探讨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民性,贾平凹思考的是在“文革”背景下的国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国民性的探索还将延续。

陈永有:贾平凹在《古炉》里注意到了霸槽与黄生生之间的区别,他们分别代表着“文革”中的两类人。霸槽不像黄生生,黄生生是那种思想被迷惑的,以为“文革”是神圣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似虔诚实则被人利用、丧失自我判断能力的“文革”小兵。他的心是瞎的,对生命无畏无惧,敢吃一切生灵,所以他死之前,鸟儿要跑下来啄瞎他的眼睛。当人表现得毫无畏惧之时,人就变成了非人,也就一步步走向了恶。霸槽却不是这样,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平凡的底层老百姓企图利用“文革”来打造自己为英雄的心态,是底层百姓长期被压抑后郁郁不得志的一种感情释放和挣扎。

曹晓华:古炉村民在“文革”到来后,或多或少都表现出盲目、疯狂,大家都丧失了理性的判断,黄生生是“文革”中非理性的极端代表。这些非理性的人性弱点一直潜藏在人心之中,当古炉村卷入“文革”风暴后,村民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被翻涌上来的人性之恶遮掩了。在《古炉·后记》中,贾平凹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1]604}“文革”之火借着人性之恶这根导火索才能燃起,这是人人都有的导火索。当我们嘲笑古炉村民的荒诞时,讽刺的矛头便指向了自身,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值得深思。

三、魔幻与伦理

杨剑龙:《古炉》中的很多人物与阿Q有相近之处,狗尿苔和阿Q一样都是想挤进中心的乡村社会边缘人物,而霸槽身上有阿Q的狡黠。阿Q是个圆形人物,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贾平凹写《古炉》,原点是丰厚的生活积累,狗尿苔、婆、霸槽等这些人物是贾平凹从生活中得来的,他把生活丰满的细节写在这些人物身上,也展示了人物本身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作品中的个别人物是扁平的,比

如善人是一个概念,是为了突出乡村里善与恶的对峙。现代阐释学有一个理论说,最好被阐释的文学作品是介于晦涩与直白之间,过于晦涩就难以阐释,过于直白就缺少阐释的意义。贾平凹在写《古炉》的时候,为了使小说显得不那么直白,使用了陌生化技巧,把一些很神奇迷离的东西放进作品中,使作品有一种陌生化的意味,显得更为奇诡、更为含蓄,同时也增加了读者去研读思考的某些空间。比如狗尿苔身上有贾平凹自己的影子,还有很多特异功能,他可以闻气味知道哪家人家要死人了,还可以跟动、植物说话。贾平凹认为这些描写跟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无关,中国乡村社会就有很多灵异的东西。但他说过自己受东、西方的美术影响比较深,西方现代派艺术中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影响了贾平凹的创作。

曹晓华:贾平凹把神秘叙事作为一种美学追求,将乡村中各种灵异、反常、无法解释的现象一一呈现出来,给读者带来奇幻的阅读享受。许多人认为贾平凹一直在有意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他自己也承认喜欢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但他主要是以乡土中国作为灵感土壤,将各种民间想象和巫神鬼怪等元素融入文本。比如霸槽挖太岁、乞风、通说等描写比比皆是,贾平凹用写实的笔法将其展示出来,延续了带有浓重中国乡土气的创作风格。在描写这些乡村巫神鬼怪时,他还糅合进了农村对“天”“地”“人”等传统伦理的认识,如黄生生的死照应的是“报应说”,善人的说病照应的是“五行说”等。

杨剑龙:《古炉》体现的某些思想与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相契合,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余脉,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中国乡土社会有一个差序格局,包括儒家传统中的君臣父子秩序。这种格局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形成的一种伦理秩序,“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这个差序格局被一场外来风波打破了。原来在乡土社会地方上掌握话语权的人没话语了,那些沦落在乡村社会底层的霸槽们、阿Q们开始趾高气扬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这种乡土文化的长与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乡村比城市显露得更深刻、更意味深长。

王童: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实际是一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8]的乡村伦理秩序。“文革”爆发后,古炉村村民对传统伦理秩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构成作家笔下的三种人物类型:乡村伦理秩序的维护者支书、善人;伦常秩序的颠覆者霸槽、麻子黑;对社会秩序既无维护之力又无颠覆

之心的调和者狗尿苔、婆。支书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宗族长者。他以精明威严“降服”村民,依靠道德伦理“感化”村民,努力巩固宗族伦常。但是,支书从根本上还是个不脱小农意识的农民,在制定政策时总想着自己。如果说支书对古炉村伦理秩序的维护尚存几分利己色彩,那么善人则是完全无私地为维护伦常出力。善人是作家有意为之的人物,是伦常道德的象征,他为异化社会添上一丝亮色。然而在人性罪恶爆发的“文革”年代,善人注定维护不了善,维持不住每况愈下的伦理秩序。小说末尾,目睹传统伦理道德的沦落,善人万念俱灰、怅然自焚。霸槽是乡村伦理秩序的颠覆者。他把古炉村的秩序、道德、伦常搅了个底朝天。霸槽和阿Q,同样的落后和异化,阿Q幻想“革命”后成为未庄主宰,杀王胡、打小D,这是利己;霸槽期望通过颠覆古炉村的旧秩序,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这还是利己。阿Q、霸槽抱着同样的利己目的,革他人的命,进自己的爵,为我们表演出何其相似的“革命”闹剧。狗尿苔是乡村伦理秩序的调和者。他纯然依照良心行事,迷迷糊糊地遵守伦理道德,不知不觉地调和乡村伦理秩序,成为异化社会中一个充满人性光芒的天使。狗尿苔的调和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在“革文化命”的年代,作为儒家文化一部分的传统伦理道德,势必要被碾得粉碎。

陈永有:贾平凹对于伦理秩序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对魔幻世界的描绘上。《古炉》里的魔幻色彩比《秦腔》和《废都》要更加浓郁。《废都》里的牛,是以独语的形式向读者抒发内心的感情,牛的长篇大论在小说中显得很突兀。《秦腔》中的引生能看到人头上的火焰来判断人的生命力,小说中的动物也具有一定的人性,但是,人与动物之间依然存在着隔膜,无法自由交流。到了《古炉》,这层隔膜才在真正意义上被捅破了,人畜之间的失语状态以狗尿苔这个充满幻想的孩子懂动物语来打通。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善与恶两个世界的对比。魔幻世界里的人与物往往表现出一种被人界泯灭的伦理秩序,比如全村动物赶着给12岁的母鸡祝寿,而古炉村辈分很高的婆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尊重。《秦腔》显露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缅怀^[9],而《古炉》是在“文革”极端的语境中作者进一步思考传统元素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可缺失。

曹晓华:《古炉》采用了儿童视角,通过狗尿苔的眼睛来看一切。在他眼里,人身上现出了兽性,而兽身上却有人应有的温情。狗尿苔能与动物交流是因为他坚信“万物有灵”,尽管自己饱受歧视,他仍能用

一颗童心去关心身边的动物。看见霸槽在撕一只蜘蛛的腿,他上前搭话引开霸槽的注意力;他掰牛铃的手臂,因为牛铃掰去了一只螃蟹的腿;他安慰老顺家被剃了毛的白毛狗、和猪一起吃一起睡……这些描写使那个恶泛滥的年代里多了一抹暖色。狗尿苔和婆身上都体现出人性善的一面。书中有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细节,婆能把“大字报”变成一张张有生命的剪纸,实际上暗示着将“恶”向“善”的转化。

杨剑龙:新时期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文学,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文学理论引进以后,拓展了作家的视野,且不说贾平凹是否受到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学影响,但是,整个新时期以后的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角度,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少新时期作品都采取主人公那种似疯似傻的叙事角度。如果没有马尔克斯这样一类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很多作家可能不会从引生或狗尿苔这样的角度去叙事,这种叙事构成了当代小说的复杂性、混沌性和多义性。贾平凹从狗尿苔这样一个少年人的角度去看“文革”,一方面他放进了自己的“文革”记忆和体验,另一方面从一个似懂非懂的孩童的视角出发,可以不加掩饰地,很真实地来看“文革”。鲁迅13岁的时候遭遇家庭变故,才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10],眼光和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才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0]。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视角是最纯洁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文革”视角,贾平凹在《古炉》里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是他精心结构、精心思考的。其实,“文革”的那种分裂、矛盾、对峙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文革”思考“文革”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四、闹剧与写实

曹晓华:《古炉》中有一段通过狗尿苔的视角看红大刀和榔头队喊口号的描写:他“猛地睁开眼,似乎看见东边西边的人脖子是那样奇怪,头和身子像是被什么力量拉着了,只有脖子在长,在长,这些长脖子斜着往对方一顶一抖”^{[7]397},他们的长脖子与鲁迅《药》里的看客看刑场杀人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盲目和丧失自我,同样的以别人的苦痛为快乐。这种对国民性的批判也体现了贾平凹的责任感:“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11]

杨剑龙: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受到孙犁的影响,描

写人情美、人性美,从动荡和丑陋中看出恬静和美丽,可以说后来他逐渐从孙犁走向了鲁迅,开始写乡村的丑陋。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都是中国传统中的那种贤妻良母型的,是柔美的,这种风格往前可以延伸到沈从文和废名,用抒情笔调来写乡土,属于乡土抒情这一脉。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脉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写乡村的丑陋、颓败和人性之恶,一直延续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从整体上来探索国民性的变态。《古炉》在整体上写人性之恶比写人性之善更重,因为在“文革”这样一个背景之中,善是不堪一击的,善人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了。古炉村的这场“文革”,回过头来看是一场闹剧,但闹剧里头有很多的文化韵味。古炉村这个历史悠久的炉,炉里装的是恶之火,再深厚的文化到这个炉里也要被熔毁,炼出的不是丹,而是人性之恶。不管从象征也好,意象也罢,贾平凹是想在“文革”的记忆中来写人性,写人性在那个语境中间的恶,在这样一场闹剧和噩梦中去寻找人性的善。

王童:如果从接近鲁迅风格的角度来讲,贾平凹在《古炉》里采用的展示手法即是一例。小说注重场景的“展示”,作家就像在小说里搭建了一个舞台,他让古炉村民都登台表演“文革大戏”,让读者来审视这场“文革”闹剧。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一幕可悲可笑的生活闹剧,闹剧的“主角”是行运、护院老婆、狗尿苔、秃子金和水皮,“配角”是长宽、灶火等村民。闹剧开演,这群活生生的古炉村民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你争我吵、互不相让:山门前,护院老婆和行运为一元八角钱吵得不可开交,双双发下毒誓;杜仲树下,秃子金百般欺负狗尿苔,狗尿苔又气又恼还嘴顶撞。贾平凹对这场闹剧的展示与鲁迅《风波》中的“辫子风波”相似,鲁迅让七斤一家、赵七爷、八一嫂等村民在土场上你呼我叫、又打又骂,民众的滑稽愚昧跃然纸上。

陈永有:贾平凹和鲁迅在生活经历上有某些相似处。贾平凹小时候也曾一度被人看不起,有一个村妇还当着他的面数落他没出息,后来贾平凹说要成为作家“得有生活,得从小受到歧视”^[12]。“文革”时期贾平凹的父亲又因为档案上记录着参加过胡宗南的一期讲训班(事实上他父亲那天没去),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世人的侮辱、殴打,几年后才得到平反。这一段坎坷的经历使贾平凹得以与鲁迅一样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对“文革”有更深刻的体悟。《古炉》中,贾平凹是把整个“文化大革命”当做一场闹剧来写的。小说结尾写狗尿苔和牛铃以敢不敢吃屎来赌面,这场游戏的背后暗示了

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历史反思。“咱谁也没得到一升面,倒是吃了两堆屎么?!”^{[7]600-601}折腾了这么长时间的古炉村,到头来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好处!这一番顿悟隐喻在一个孩子(叙述人)的游戏中,浑然天成、耐人寻味。

杨剑龙:贾平凹写《古炉》是有他的野心的,“‘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越更无力把握”,“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地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1]604}。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文学家以他的形象和体验,用文学的笔来写出那种“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不是去简单地图解生活,而是去呈现生活的丰富性,人们往往用自己的体验去解读。“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1]604}贾平凹是想通过古炉村来写中国人的这段历史,无论他写得如何,至少提供了很多生动的“文革”历史记忆。贾平凹有一种作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觉得“文革”还有很多没有被人所认识的东西,要回过头去看。在《古炉》的世界里,他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以狗尿苔为视角,去反省这场民族灾难产生背后文化的、心理的、民族的种种问题。虽然不能说《古炉》特别完美,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我特别赞赏贾平凹的创作心态。在文学商品性异常突出背景下,很多作家都去迎合读者、迎合市场,贾平凹却坚持去写他想写的、记忆深处难以抹去的东西,写他对这种生活的思考,无论他思考的深度如何,至少这种坚守自我的创作方式是作家创作时值得推崇的境界。贾平凹小说的写作风格有点像秦腔,有一种土得掉渣的韵味,高亢中夹杂着悲凉,似乎像流水但又常常碰到流水中的礁石、树杈,似乎在表面的波澜不惊中有着着一股内在的波澜,似乎在絮絮叨叨的话语里头有着某种悲哀,有着某种感伤,《古炉》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贾平凹.古炉·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2]陈思和,杨剑龙,王鸣生等.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J].当代作家评论,2005(5):31-35.
- [3]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4]南帆.找不到历史:《秦腔》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06(4):66-70.

- [5] 贾平凹. 高老庄·后记[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415.
- [6] 许爱珠. 性灵之旅: 贾平凹的平平凹凹[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
- [7] 鲁迅. 阿 Q 正传[M]//鲁迅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38.
- [8] 孟轲.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M]. 梁海明, 译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83.
- [9] 傅异星. 在传统中浸润与挣扎: 论贾平凹的小说[J]. 文学评论, 2011(1): 86-93.
- [10] 鲁迅. 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37.
- [11] 贾平凹. 贾平凹文集: 第 16 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08.
- [12] 贾平凹. 我是农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94.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em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JIA Pingwa’s Novel *Gu Lu*

YANG Jianlong¹, CHEN Yongyou², WANG Tong², CAO Xiaohua²

(1.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Culture,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y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em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JIA Pingwa written a novel named *Gu Lu*. As the child named Gou Niaotai for narrative perspective, *Gu Lu* describes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get great changes in the mind,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Gu Lu* inherits the realism writing style like Lu Xun, to get human nature in trivia description, dig absurdity in the iron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memb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outline of magic world and think abou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farce.

Key words: JIA Pingwa; *Gu Lu*; “Cultural Revolution”; realism

征稿启事

2500 年来,道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当代人类在反省自身发展模式 and 未来命运走向、积极探索解决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之时,老子哲学、道文化日益显示出某种和谐发展的价值导向和普世的文化特征,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河南周口鹿邑是老子故里,道文化是这里的地域特色文化,一直以来,我刊一直努力打造这方面的特色栏目。从 2009 年起,我刊把“道家文化研究”改为“道文化研究”专栏,并以 2008 年 10 月周口老子学术研讨会(“老子思想与构建和谐”)会议论文集集中的几篇文章为基础,以“道文化与社会和谐”为主题,组成“道文化研究”栏目的第 1 期文章。

欢迎以全新的视角对道文化经典诠释解读、对道家诸子的研究、对道文化传承流变的研究、对道文化思想的研究的力作。我刊“道文化研究”栏目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2011 年 6 月